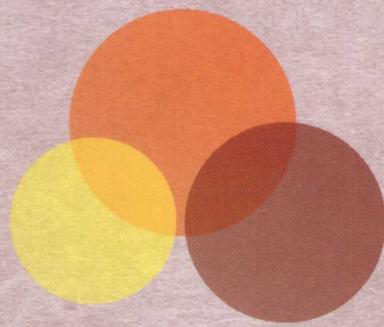


高校评估 政策伦理分析



——以我国首轮本科教学评估为例

刘理 董垌希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高校评估政策的伦理风险及其规避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卓越导向的湖南本科高校分类评价体系研

高校评估政策伦理分析

——以我国首轮本科教学评估为例

刘 理 董 峰 希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校评估政策伦理分析:以我国首轮本科教学评估
为例 / 刘理, 董垌希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305 - 16058 - 5

I. ①高… II. ①刘… ②董… III. ①高等学校—教
学评估—研究—中国 IV. ①G64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76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名 高校评估政策伦理分析——以我国首轮本科教学评估为例
著者 刘理 董垌希
责任编辑 张磊磊 蔡文彬 编辑热线 025 - 83686531

照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刷 扬州市江扬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42 千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6058 - 5
定 价 36.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一

李 明^①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对高等学校进行外部评估已成为国际惯例,质量保障与评估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及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如何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制度。但从目前看,对高校进行外部评估,在实践中又似乎是一件并不太受欢迎的事情,甚至往往有点“费力不讨好”。

自2003年开始至2008年收官,由教育部主导实施的首轮高校评估,即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制度的一种努力。与首轮高校评估推进过程的轰轰烈烈一样,多年来围绕这一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质疑与争议也一直不绝于耳。如何进一步完善工作评估制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主要实际问题。

高校外部评估的看法,实际上折射了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认识差异: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看,高等学校是“理性的堡垒”和“自由的天空”,“宁静”和“庄重”是其特质,与现实保持适度距离的“象牙塔”意蕴是保证高等学府自由探索“高深学问”的前提;而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来看,作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高等学校,必须积极回应现实社会需求、服务现实社会发展,高等学校唯有与社会“和光同尘”才能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也就是说,依据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高校外部评估多余;而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视角,外部评估不可或缺。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高校评估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高校及个人。评估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涉及价值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问题。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官僚机构也是按“理性经济人”模式行事的,他们的行动原则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高等教育质量评估“行动者”也不例外,为维护自身的利益,都会通过一定的官僚机制尽可能拓展自身的利益范围。在社会大系统中,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往往存在冲突和矛盾,政府活动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中制定对所有人(群)具有约束力的一致性的政策,一方面对教育资源进行社会分配,

^① 李明,男,管理学博士,教授,现任湖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

另一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约束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活动的成本。在我国,政府主导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能力要受到各种因素的规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划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评估是由人具体实施的,包括评估组织者、评估专家、评估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缩影,个人的社会关系、个人的认识水平和人格素养等都会深刻地影响评估过程中个人的行为。因此,作为一项教育政策,对于高校评估,除了按照“真”的原则来看待与衡量,还应按照“善”的标准来考量。从既有研究及社会的议论来看,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是人们对其不满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一政策做少了“好事”,而是因为其多余功能缺乏伦理规制而做多了“坏事”,致使这一政策蒙上了“善性”不足的伦理阴影。因此,本书中作者主要不是解决如何使高校评估政策变得更科学的问题,而是如何使高校评估政策在充分发挥正向功能的同时变得更具伦理境界,从而更易于被社会广泛接受。即这一政策如何有所不为、承载更多公共关怀与道德责任。

由于高校评估的实践品性,要深化对高校评估政策的认识,提升评估政策的伦理品性,推进高校评估的科学发展,还得回到真实的评估实践本身,对似乎不再需要讨论的“常识”的事实与前提进行再思。而一旦我们直面谢幕不久的我国首轮高校评估政策实践,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评估政策如何提升公信力以赢得广泛接受?评估政策如何提高执行力以避免“好经”被“歪念”?两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即评估政策如何更具“善性”、少产生显现和隐性的负面影响?如何在“有所不为”的基础上更加有所为?这是高校评估实践向理论界提出的最基本问题。本书作者从政策伦理风险视角,面向真实的高校评估政策实践,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思路,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根据“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贝克(Ulrich Beck)的观点,“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亏损和伤害的起点。鉴于高校评估活动开展的独特的内在逻辑,现行的工具理性取向的高校评估政策必然会在大学精神与使命、学术生态与文化、公共关怀与道德担当等方面造成伦理风险。本书作者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层面,以我国首轮高校评估实践为研究对象,对现实中的高校评估政策的伦理风险进行了理性思考,对高校评估政策理论风险的表象进行了归纳,深刻揭示了其产生的原因,并对如何主动规避高校评估政策伦理风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思考。

本书由我校教育科学研究所刘理教授与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董炯希博士合作完成,两位都是教育学博士,而且均直接参与了首轮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许多工作,本书的内容既体现了两位著述者的学科背景,同时也表达了

他们从教育政策伦理维度对高校评估实践的理解与思考,从高校评估政策实践中提炼出来若干鲜明的理论观点,无疑对教育评价理论的丰富作出了贡献,并对高校评估政策的优化有一定参考价值。值得肯定的是,本书对于我国首轮高校评估实践中的不足,不是停留在批评指责,而是从教育政策伦理的视角在中外高校评估的整体脉络中对首轮高校评估进行理性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很难说已经是完善的定论,但不可否定的是这一研究是建设性的。

我还刚来到湖南理工学院工作,与两位作者也还都是“新朋友”,但我很乐意为本书作序。

2015年8月26日于湖南理工学院

以退为进 改进中国高校评估^①

（代序二）

刘理 张彦通^②

[编者按]政府的强力推进是首轮高校评估能够轰轰烈烈展开的主要因素,但这种运动式的大面积铺开也是导致负面影响和产生政策伦理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首轮高校评估,很有必要退回到制度层面进行伦理反思,从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角度认真反思评估制度设计,以为下一轮评估提供制度层面的参考。中国高校评估将改向何处?首轮高校评估政策的实践为中国高校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两位分别来自地方基层高校和中央政府部门的高校评估研究学者之间进行的一场学术对话,或许为寻求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高校评估要继续要改进

刘理:近年来,高等教育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也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主流话语。首轮高校评估已于2008年在一片争议中落下帷幕,新一轮评估正在筹划之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将“改进高校教学评估”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而高校评估到底“改什么”、“如何改”,下一轮评估具体应如何推进,对此,《纲要》并没有给出明确回答。

张彦通教授是中国首轮高校评估体系的设计者之一,多年来一直从事高校评估研究,并参与了《纲要》的研制。我很注意研读张教授近年来关于高校评估的文章,发现张教授既是高校评估的积极推动者,同时也对评估实践提出过不少

①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8日(总第134期)。

② 刘理系本书作者;张彦通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业务一司司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进建议。

张彦通：你所提及的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多人都在研究，我觉得这很好，说明大家都觉得这项工作重要。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纯学术性的思考，不代表我所服务的机构。

做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首先要从新近颁布实施的《纲要》出发。《纲要》明确提出要“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它给出了这样的信号：评估工作不能停止，要继续开展下去，但评估工作需要完善。有些人怀疑评估还要不要再搞下去，我想《纲要》已给出了明确的意见。我参与了首轮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很多工作，有很多体会和思考。从首轮评估的实施情况来看，总体而言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作用很大，问题不少。对于中国下一轮高校评估，我个人的意见也是八个字：加强研究，审慎推进。首轮高校评估的出发点是好的，时机也是合适的。在高等教育大扩招的背景下，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对稳定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到后期却遭受到许多批评，甚至成为“两会”期间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因此，我们需要坐下来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系统地总结一下首轮评估的经验教训，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设计更好的评估制度，以退为进，做到“谋定而攻”，而不是匆匆忙忙再大面积铺开评估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用这个时机多开展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必要。

与以往高等教育领域改革不同的是，这次《纲要》实施没有大张旗鼓地开展“自上而下”的布置和安排，而是鼓励“自下而上”改革试点。很多省市和高校已经上报了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思路和举措。如果各省和各高校都能积极主动地发挥优势开展试点和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局面就会很有生机，多样化和特色化会更加突出，高等教育发展也会更快。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纲要》特别关注的话题，评估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有力保障。

首轮评估问题出在评估体系之外

刘理：“以退为进”，说得太好了！我注意到，张教授曾在《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高校评估制度变迁形式主要是强制性变迁，前期制度供给充分，而后期相对不足。强制性变迁对高校评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于高等教育的特色化和多样化发展考虑不足。在调查研究中，我也发现，政府的强力推进是首轮高校评估能够轰轰烈烈展开的主要因素，但这种运动式的大面积铺开也是负面影响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

首轮高校评估,很有必要退回到制度层面进行学理反思,从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角度认真反思评估制度设计,以为下一轮评估提供制度层面的参考。

由于各方面原因,中国现代高校的自主性一直不强,尤其是中国公立高校的出场路径是作为政府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在自我缺失和基本属性不明的情况下,高校的注意力往往放在教育以外的因素上,强调高校的社会工具理性,所以,中国现代高校一直以来优先考虑和遵循的是政治规律和经济规律,教育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体现。当然,教育必须讲政治!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主导的高校评估,正如有的学者所担心的,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促使高校强化行政色彩,从而有损大学的自由精神和高校办学自主权。因此,我们应该从高校评估实践中退回去,退回到理性维度,从价值理性层面仔细审视这一制度,找出高校评估问题产生的制度因素,这对于重新设计更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高校评估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张彦通:是的。我赞成多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去分析和反思,不要简单地批评某些现象。从首轮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实践来看,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在评估指标体系的制定和修改方面,指标体系和标准做得很细、很全,应该说评估指标体系设计还是比较严谨和科学的,但在实践中指标体系的作用并没能有效发挥出来,我们很多专家在理解和运用评估标准方面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化了。客观地说,首轮评估到后期阶段,评估指标体系越来越完善,但专家们评估时所依据的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指标体系了,指标体系之外的因素太多、影响太大,致使评估结论越来越偏离指标体系了。最终,评估指标、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变成三张皮,彼此关联度越来越小。更有甚者,有些专家根本都不去熟悉和研究指标体系,只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走完过场,按照大家心照不宣的结论投票就算完事。这种现象后面有太多的制度设计问题,非常值得反思。

因此,我主张对中国高校评估的制度设计进行认真反思,积极研究不停步,一定要打破首轮评估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确保今后高校评估在制度层面有所创新。

刘理:我完全同意张教授的看法。我刚主持完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对我国首轮高校教学评估实效性的实证研究”课题,通过大量的调查,我发现,首轮高校评估的主要问题不在评估体系本身,而在评估的背景、程序,在于评估背后那只无形而有力的手——行政权力。

学术界对首轮评估产生的许多非议,主要针对的不是评估指标体系,也不是学校接待专家规格的超标,而是单一的行政性评估对本来就十分脆弱的高等教育领域行政与学术两种权力生态的冲击。首轮评估对高校领导层积极性的调动

作用较大,这本来是件好事,领导具有资源动员和配置力,领导重视的事情办起来效率会更高,也更顺畅。但学校领导的这种积极性放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大背景下,就是一柄双刃剑——在促使评估工作轰轰烈烈运转的同时,凸显的是行政和管理的声音,在热闹的表面背后,对作为高校办学主体的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积极性调动还不够。所以,虽然评估促进了领导的重视而大大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但作为受益者的师生们似乎并不完全领情,“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我仔细研究过,社会上对于高校评估的批评和非议,有不少是对评估的误解甚至曲解导致的,而高校评估为什么会引起“误解”和“曲解”,以后的评估如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曲解”,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张彦通:你讲到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高等教育评估本身是政府对高校实施宏观管理和指导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其目的在于既要尊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又要引导高校加大对教学的投入,加强对教学质量与规范的重视。但评估在后期被过分功利化了,于是评估工作就在“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气氛中遭到了扭曲。

当然,对于首轮评估中社会的批评和议论,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有的批评是客观的,也有的批评是硬加到评估头上的,还有的批评是对评估的误解造成的。评估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评估对促进高校加大对教学的投入、加大对教学的重视、加大对质量的关注等积极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认为,对评估的议论多也是好事,这反映了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及质量的高度关注,也反映了社会对更加科学合理的高校评估制度的期盼。这对高校评估的完善及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有利。必须看到,高校评估应是一桩十分理性的事情,需要的是清晰的思路、科学的方法以及客观的评判,而不仅仅是激情。

反思制度设计审慎推进评估工作

刘理:张教授所讲内容给我们启示很大!从世界高等教育评估实践来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评估都是一件不太受高校欢迎的事情。尤其中国的高校评估起步较晚,评估本身更有一个不断改进与完善的过程,首轮高校评估招致社会较多的议论甚至非议很正常。问题在于我们应从首轮评估的激进和激情中退回去,冷静下来清醒地想一想,想一想首轮高校评估到底留给我们什么启示,首轮评估这部政府的“好经”到后来为什么在执行中被“歪念”,想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接下来的高校评估该如何开展有重要价值。退是为了更稳健地进,缩回来的拳头,打出去才会更有力。

记得当年随张教授去一所大学评估，您所说的一句话印象很深：评估不能变成评比，评估主要是一个质量改进的促进过程，而非制造和追求结果；评估主要是方式方法和目的的匹配问题。对此，是否可这样理解：对于高校评估，还应该回到评估的“目的”这一制度设计的起点对评估进行反思。

张彦通：的确如此。方法之于目的始终是下位的，任何一种方法和体系，都要服务于一定目的。评估的目的即到底为什么评估，这一最基本问题不弄清，评估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偏离方向。因此，对高校办学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一定要搞清楚评价的目的是什么，开展这项评价是为了什么，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一定要十分清晰。我不主张把评估过分功利化，不赞成对高校进行排名，以免把“评估”搞成“评比”。我也不主张评价结果与政府对学校的投入直接挂钩。因为，在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生存环境下，只要一排名、一与投入直接挂钩，评估就会“变味”。评估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教学工作的改进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还有一点：评估并非万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不是只有评估这一条路！

总之，如果能冷静分析和总结一下，对做好下一步的评估工作会有很多好处，可以从过去的实践中找到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与着力点。我所说的不是倒退，也不是盲进，而是“审慎推进”。做到积极研究、科学谋划、慎思稳进，下一轮评估才会取得更理想的实效，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事业才会持续健康发展。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高校评估政策伦理问题的提出	1
二、相关研究综述	6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22
四、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27
第二章 中外高校评估政策伦理线索追踪	30
一、高校评估的基本含义	31
(一) 教育评估的界定	31
(二) 高校评估的特性	37
二、高校评估的模式	41
(一) 西方教育评估的模式	42
(二) 我国的高校评估模式	45
三、高校评估的价值	48
(一) 评估价值的构成	49
(二) 评估工具价值的发挥	53
四、高校评估的历史发展	58
(一)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评估的发展历程	58
(二) 中国高校评估的产生与发展	65
(三) 比较中的启示:评估政策伦理问题	70

第三章 高校评估政策伦理的教育价值分析	77
一、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的含义及构成	78
(一) 高校评估教育价值的含义	79
(二) 高校评估教育价值的构成	84
二、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的属性分析	87
(一) 价值的内在与外在之分	87
(二) 高校评估教育价值的双重属性	88
三、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的人本取向	91
(一) 高校评估的目标主体是人	92
(二) 高校评估的责任主体是人	93
(三) 高校评估的价值主体是人	94
四、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的目标追求	96
(一) 教育规范是高校评估的基本伦理目标	96
(二) 教育自由是高校评估的深层伦理目标	99
(三) 生命价值是高校评估自身的存在伦理	102
第四章 高校评估教育价值偏差的发生机制	105
一、高校评估指标的教育价值及其偏差	106
(一) 高校评估指标的结构与内涵	106
(二) 高校评估指标教育价值的实践偏差	120
二、办学特色的教育价值及其偏差	125
(一) 办学特色的教育价值内涵	125
(二) 办学特色教育价值的发生机制及实践偏差	128
三、高校评估程序的教育价值及其偏差	133
(一) 高校评估的基本程序	134
(二) 高校评估程序的教育价值定位及实践偏差	136
四、现实问题及其改进的伦理之维	140
(一) 存在的主要问题	140
(二) 问题改进的伦理思考	142
第五章 高校评估实践教育价值偏差的伦理规约	146
一、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生成的实践准则	146

(一) 高校评估实践准则的意义与依据	146
(二) 高校评估实践准则的内容构成	148
二、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生成的代价意识	152
(一) 代价及高校评估代价的基本含义	153
(二) 高校评估代价产生的原因分析	156
(三) 低代价实现高校评估教育价值的思考	158
三、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的能力表达	161
(一) 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能力的实然分析	161
(二) 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能力的应然性审视	168
四、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的能力限度及提升	173
(一) 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的能力限度	173
(二) 高校评估政策伦理教育价值能力的提升	179
第六章 喧嚣与理性:高校评估政策的伦理超越思考	187
一、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差异:高校评估政策伦理困境之源	188
二、分类指导与卓越发展:高校评估政策优化的伦理之维	192
三、教育价值关怀:高校评估政策伦理风险化解机制	194
四、生命价值追求:高校评估政策伦理终极目标	197
五、喧嚣中的理性:高校评估政策的伦理超越	200

第一章 绪 论

一、高校评估政策伦理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时代。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在各领域风行,高等教育质量话语开始从高校内部向外部转移,高等教育质量成为世界联合组织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并开始实施控制的事情,各国纷纷制定并实施了高校评估政策,作为“理性的堡垒”的高校,从此迎来了评估的“喧嚣”。^①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由这些机构通过评估等手段对质量实施监控。

国外实践证明,外部评估对高校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约翰·布伦南等人对17个国家29所高校和7个国家质量评估机构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评估给高校带来的影响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学校对质量的重视和高校文化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和官僚化趋势增长。^② 因此,如何认识与规避高校外部评估的负面影响,提升评估政策的伦理境界,正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课题,如美国六大区域认证协会都在不间断开展改进质量认证的研究,对高校质量认证的标准和过程等内容不断进行改进和调整。

在我国,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对高等学校办学水平进行评估”的要求以来,原国家教委于1990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教育部于2003年始实施了五年一轮的高校评估政策。随着首轮评估于2008年在争议中落下帷幕,我们注意到,评估在给高校发展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其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也引起了社会的误解和强烈

^① 约翰·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② 约翰·布伦南著,陆爱华译:《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一个关于高等院校评估和改革的国际性观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不满。2008年、2009年“两会”期间的部分代表和委员连续两次“炮轰”高校评估，直指高校评估“俨然是一场可怕的烧钱‘游戏’”，以及发生在评估中的“美女秘书事件”所引发的热议让人记忆犹新。尽管对于社会上对高校评估的这些批评和指责，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种种迹象表明，评估作为一种精致化的管理技术和工具，运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伦理风险，对这种伦理风险缺乏清醒认识及主动应对是影响高校评估实效性、制约高校评估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随着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在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建立一种具有“正当性”和“合道德”的评估政策，以确保高校评估尽可能少产生负面影响，已成为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共同热门话题。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高校评估政策的作用对象是高等学校，因此，认识评估政策首先要认识高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高校的独立性不强，高校一直处于被社会风浪与潮流冲击得晕头转向之中：要么泛政治化，教育的政治功能被无限放大和严重扭曲，高校被等同于国家专政机关，成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坚强阵地”；要么泛经济化，当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高校在经济发展这一社会的主战车上的动力作用为世人所刮目相看时，“钟摆”又偏向了另一边，教育的经济功能又被无限扩张，关注的焦点放到了采取各种途径创收和把学校这块“蛋糕”做大上，出现了将高等教育“经济化”、“市场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本体职能的高层次育人和高水平研究容易被淡漠，教育自身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人才培养的质量受到了影响。

雅斯贝尔斯说：“学校越开放，对外部要求就越敏感，从而过于轻率地适应眼前需要而放弃长远责任的危险性就越大”。^②应该说，这恰好是我国高校的病灶。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快速发展，“去行政化”任务还十分艰巨的我国高校，在知识界早就按捺不住对高校院墙外的喧嚣声的激动而纷纷呼喊着要“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的中心”的口号声中，又陷入了新的异化：高校又成了市场和社会的奴隶，在追求与市场和社会的无限接近、由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中心的同时，高校被“手段—工具”所摆布，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② [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页。

在“目的—价值”上陷入迷失。大众文化的扩张和精英文化的边缘化,以及过于沉重的社会使命感,导致了高校外在社会功能的不断拓展和内在教育品性的日渐衰微以及意义世界的贬损,本应是高校内在品性的必要的为教育而教育、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日渐失去存在的市场。^① 事实证明,过于沉重的社会和历史使命感有时恰恰又是高校发展的包袱,阻碍着高校本真功能的有效发挥。高校试图回避现实社会的基本命题而直接进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固然不可行,但试图回避象牙塔的基本意蕴和教育的内在品性而直接走进社会的中心,在躁动与喧嚣中,只会造成高校本真的丢失和价值贬损,不但种不好别人的田,还会荒了自己的地,从而造成高校的历史退步。

我们认为,与社会大众文化的热闹与喧嚣相比,高校从某种意义上应适当恪守其边缘组织的意蕴,维护其适当的精英文化性质,承担其对社会大众文化的批评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既服务社会又制衡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我国高校在外延大扩张的同时,需要“退而结网”,追求内在品性的完善和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高校作为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文化机构,除了要适应社会变化之外,还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即教育本身的规定性,这种内在的规定性是高校之为高校的根本,也是高校发挥社会功能的动力源。

要引导我国高校走出在盲从社会中丢失自我的误区,回归高校之为高校的育人本质,必须有一种能打破传统的单一政府行政管制的力量出现,改变高等教

^① “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学术观念。在我国,梁启超较早提出“为学问而学问”的概念,其含义有二:一是表达了一种与“经世致用”相对的知识观,学问本身即为目的;二是反映了一种学者治学的态度,学者必须以学术自身为目的,“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见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3 页。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上几乎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传统,学术没有其本体的地位,中国传统士大夫“还不能想像学问可以脱离实践而自成一独立领域”。见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593 页。许纪霖也提出,“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发展出具有责任伦理意识的独立政治传统,也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统。”见许纪霖、陈思和等:《学统与政统》,王晓明主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0 页。另有学者提出,为学术而学术并不意味着学术与学者可以完全与社会脱节,作为个体的学者可以为学术而学术,但作为整体的学术最终必须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学术研究关涉社会和现实是学术自觉和学者自立的显现。见余三定著:《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11 页。